

论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

历史视角的民主研究

林猛撰

论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

——历史视角的民主研究

中文摘要

与民主相关的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争论不休，甚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譬如，什么是民主，民主在政治体制中是一种什么角色，等等。作者在本论文中，试图从历史的、比较的视角对上述争论做出自己的回应。

我们知道，人类迄今为止，一共有过两段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期，一段在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另一段在当代。前者我们称为古典民主，后者称为现代民主，它开始于 18 世纪末期的欧美，现在已经扩散到整个世界。

在古代雅典，我们看到，在民主形成之前出现了若干有助于下层民众势力崛起的趋势。由贵族垄断的旧制度遭遇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而濒临崩溃。人们在尝试过寡头政治和僭主统治、而且都宣告失败之后，意识到惟一的出路只在于使全体民众都享有同等的资格参与城邦公共生活。不过，雅典人并没有把由此而形成的统治称为民主政治，因为贵族的权力机构仍然在城邦的事务中发挥了决定作用。一直到公元前 462 年，民众剥夺了贵族机构的权力，与此同时，又以抽签代替选举作为官方产生的方式，并引入公职津贴制度，以便鼓励下层民众能够在事实上享有同等的参与机会，只是在这时候，民主政治在正式出现。在古代思想家那里，它就意味着民众掌握城邦权力，意味着轮番为治，意味着城邦要采取很多有利于下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措施。

在近世欧洲，我们又看到了近似的趋势推动了民众势力的增长。旧制度遭遇了同样的危机。旧的权力精英可以有多种选择来应对这股潮流，而其中后来成为主流的自由主义的一种，它的支持者意识到这股潮流是无可阻挡的，民众必然会进入政治领域。所以，明智的抉择是接受它，顺应它，同时，尽可能使已有的成果，自由和权利观念，不被这股潮流吞没，而使两者能够共存。然而，在他们的努力中，就包含了后来成为现实的一种危险，那就是民主的含义发生变化，它溶入了其他内容，而它本来是我们，我们反而无从知道了。于是，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精英民主理论将民主的含义修正到了与古代实践恰好相反的地步：民主就意味着选举。

作者在本论文中并不赞成这样一种修正，它只是使问题更加混乱而不是更清晰。作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保持民主的原意不变，虽然它的实现方式和评价尺度可以与古人不同。而就此而论，现代政治，至少从它已经建制化的体制看，并不能算做纯粹的民主政治，它的民主，其实体现在体制之外，在各种社会运动中。而在建制和建制之外的民主力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正是现代政治的奥妙和长处所在。

最后，就中国政治而论，在二十世纪我们有很多教训需要总结，有很多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而首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西方借鉴的经验是，要在已有的建制和建制外的推动力量、在建制和民主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关键词：古典民主，现代民主，民主，民主化，人民，平等的发言权，表演文化，自由主义，精英民主，社会运动

On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What is Democracy See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Scholars in social science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questions concerned with democracy. For example, what does democracy mean? What is the role for democracy in a political system? Even in such fundamental questions there has been no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as given his own response to such controversy from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As we all know, till now there has been two periods in human history when democracy has been set in motion, one in ancient Greece, especially in Athens, the other in modern world, beginning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 While the ancient democracy used in this paper stands for the former constitution, the modern democracy refers to the latter.

Some trends are discerned in classical Athen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rising of the *Demos*. The *ancient regime* dominated by the *Eupatridai*, which means the well-born, falls into ruin when crisis has risen and gone out of control. After oligarchia and tyranny has been offered in vain as a way out, people find there is no other possibility but to accept everyone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affairs of the *polis* as equals. But till now it has still not been called *demokratia*, but *isonomia*, since the *Eupatridai* still takes a crucial role in decision-making through the council of *Aeropogos*. It is not until the 462BC that the *Demos* robs the *Aeropogos* of its power.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the main offices in the *polis* are chose by lot instead of by election, and the system of payment is introduced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unequal situation of the poor. And that is what the ancient thinkers called democracy, which means rule by *demos*, alternation in office and measur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or.

And in modern Europe, we can find similar trends which leads to the rising of the *Demos*. The *ancient regime* comes into great crisis, and there are many choices for power elite to do with such trends. Thinkers who agree with the

liberal strategy, which prevail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come to know that it is avoidable for the demos to come into the political sphere, and it is advisable, they think, to accept it and have it coexistent with liberty and rights. But what they have done has threatened to change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elitist theoris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uch changes do take place and democracy means only election, which stands opposite to the ancient meaning.

Such revision is abandon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author don't think it bring much advantag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democracy can be kept untouched, though the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can be different. Modern politics can't be called pure democracy, especially judged by its institutions, but we can find it existing out of the establishment, embodied in all kinds of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necessary tension betwee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democracy out of the establishment can explain the secret of modern politics.

As far as Chinese politics is concerned, there have been many lessons to lear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 lot of work to do in the futur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we can learn from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s to keep the establishment from within and the force for change from without, which exhibits the power of people, in a dynamic balance.

Keywords: ancient democracy, modern democracy,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demos, *isegoria*, performance culture, liberalism, elitist democracy, social movement.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及意义.....	1
第二节 方法与结构.....	5
第二章 古典民主的前奏：城邦、公民身份和政治平等.....	10
第一节 <i>Demokratia</i> , <i>isegoria</i> 和 <i>isonomia</i>	10
第二节 为什么是希腊：希腊社会早期的演化.....	12
第三节 为什么是雅典：城邦、公民身份和政治平等.....	18
第三章 民主政治与城邦生活.....	25
第一节 雅典民主的形成.....	25
第二节 城邦生活的特征.....	31
附 录 雅典政治史大事记.....	35
第四章 民主理想的衰落与近代的民主化潮流.....	38
第一节 欧洲历史上的反民主思潮.....	38
第二节 欧洲近代的民主化潮流.....	45
第五章 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同与异.....	51
第一节 现代民主的特质.....	51
第二节 现代政治中的古典民主.....	60
第六章 对中国民主进程若干问题的思考.....	65
第七章 结 论.....	72
参考书目.....	81

论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

——历史视角的民主研究

第一章

绪 论

“遗忘，就人之为人而言，意味着我们会丧失自身的某一维度，即人之存在的深度。这是因为，记忆与深度实为一种东西，更而言之，人除非经由记忆，否则不可能达到深度。”

汉娜·阿伦特^①

第一节 问题及意义

按照一般的看法，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有两段民主的黄金时期：第一段出现在公元前六一四世纪的希腊城邦，第二段起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北美，到二十世纪末扩散到几乎世界的各个角落。前一段通常称为古典民主，后一段称为现代民主。

这里，首先需要提及的是，本文对两个概念的使用，在所指对象上与学界流传甚广的熊彼特的用法不同。熊彼特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也曾经提出这样两个概念。在他那里，古典民主所指的，是功利主义的民主，其核心内容包括：人民选举能表达他们意志的人，自己决定争论的问题，追求共同幸福。它背后所呈现的，是“十八世纪铁器贩子的世界”；而他所称的现代民主，则是把选举代表放到首要地位，选民对问题的决定只占次要位置。这时，民主是一种达到决定的方法，它指的是某些人通过竞选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在他，现代民主就是一种精英民主，其实质对于人民就是行使选举权力，对于精英就是可以自由地竞争人民的支持。^②

不难看出，在本文中，作者使用这两个概念所指的对象与熊彼特有很大不同。本文所称的古典民主，主要指古代希腊城邦的民主理想和实践。以后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它对于“人民选举能表达他们意志的人”是没有任何要求的，相反，选举在它恰恰是一种反民主的东西。

^① 引自汉娜·阿伦特，“何为权威？”(What is authority?)一文，见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 p.94.

^②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四篇“社会主义和民主”，引文见第315页。

同时，民主、乃至政治，它的目的或许是共同幸福，但和功利主义者所称的共同幸福却有显然的差异，它并不、或者说主要不涉及物质利益，这点我们也将后文的讨论中谈到。至于本文所称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民主，也容易看出，它同时包含熊彼特的观点中争论的双方：功利主义民主和精英民主。现代民主共有的一种形式是代议制，这原本是在现代物质条件下——不再是城邦、而是范围大得多的民族国家——为了保证民众拥有对政府的控制权而构思的一种制度形式，是没有更好实现手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然而，在现实的进程中，很容易导致的一种倾向便是从这一种立场上回缩，将由于客观条件而对民众参与造成的限制确定作为一种规范，从而认为民众的角色应该仅仅限于代议制中的投票人，认为这便是民主的真义，认为形式上选举的存在便是民主最本质的特征。而这便是熊彼特、达尔等为代表的精英民主论的路线。在本文作者，精英民主也许还不是现代民主本身，但却是它（几乎）必然的衍生物。

正如上述，代议制民主就其本意来说仍是为了保证民众在现代的条件下能够掌握公共事务的最终决定权，这一点与古典时代对民主的认识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任何政体都存在这种对公共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但代议制民主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终的控制权”。^①或者，借用布赖斯勋爵的术语，我们可以说，代议制民主可以在现代的条件下，有效地保证民众享有政治的自由（political liberty）。^②不过，从现实的进展而看，尤其当它发展到精英民主论以后，它实现的其实是民众“免于政治的自由”（free from politics，阿伦特语），这种最终决定权实际已经不存在、或者说意义不大了。既然它不存在，那么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使用“民主”这个概念呢？

霍布士曾说：“语言的首要用处便在于名词的正确定义……（而）语言的首要滥用便在于错误的定义或没有定义。”^③阿伦特同样抱怨，她和当代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争吵都是因为“他们越来越不能（对概念）加以区分”。^④民主，今天正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已经不知道可以用它来表示什么，或者，从日常的经验看，好象没有什么政体不能用它来作为代指。所以，民主现在成了一个百宝箱，什么政体都可以往里塞：自由主义民主、极权主义民主、精英民主、委任民主、亚洲式民主……，民主几乎就成为了政体的代名词。如果说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世界性的民主精神”的产物，因为“即使是那些显然反民主的国家也常常用民主的价值来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⑤那真是一种讽刺。

对我们的分析而论，这样一种泛化实际导致了概念本身的失效。正如一位学者提醒我们

^① J. S. 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68页。

^② 布赖斯勋爵把自由区分为四种类型，政治自由所指的，是人们参与共同体的管理。参阅 James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Vol. 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1), pp. 53-4.

^③ 霍布士：《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23、22页。

^④ 转引自 Margaret Canovan, "Politics as Culture: Hannah Arendt and the Public Realm", in 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eds.), *Hannah Arendt: Critical Essay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4), p. 179. 阿伦特自己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的努力。

^⑤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55页。

的，“（由于）‘民主制’和‘民主的’在二十世纪的用语中，已经变成隐含了对它所形容的社会或制度的肯定，这必然意味着这些词已经降格，没有进一步的定义，不再能用来区别不同的政府型态。”^①的确，我们感到，当把政体简化为民主和专制两类，而同时又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承认自己专制时，这其实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我们分析工具的失效。民主这个概念确实不如在古典政治学的语境中那么有效了。在古代希腊世界，城邦并不需要借民主之名以自夸，不需要明明在颠覆民主政治时，仍将自己称为是一种新形式的民主，它们不惮于承认自己是寡头制。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无论民主的支持者，还是民主的反对派，对自己用这一概念指代什么，心里都是有明白的想法的，也只有这种时候，我们才可能认真探讨“民主”真正的价值和局限。

在民主语义含混的背后，隐藏着当代政治生活在认知和实践上存在的更深刻的问题。

可以说，近世的民主化与古代雅典的民主实践并无联系。或者，如果真有某种联系的话，那也是一种负面的联系，这种负面的联系表现在，在近代，现实的民主进程因为精英人士脑海里对雅典民主存在的不良印象而受到制约。这些精英人士受到雅典后期思想家以及普鲁塔克的深刻影响，对雅典民主的实际运作、对民众参与政治所可能发生的情形有非常悲观的评价，对民主的前景是尽可能加以提防。他们之提议代表制，正是要加大公民身份和实际行为的距离，使民主成为“没有人民的民主”。^②

而在今天，这种对古典经验的拒斥态度依然盛行。各种精英民主理论虽然表述或有不同，但都在现代民主和古典民主之间划下一道清晰的界限，认定后者在今天徒然只有观赏的价值。无一例外地，这些现代民主理论都是从消极的角度理解公民身份（citizenship），将民众的角色限定于投票做选举人，不支持民众参与政治体制的运作，而将后者交付给经过民众选举而产生的代表（精英）；不仅如此，在他们，民众的广泛参与可能是社会冲突加剧的表征，而对政治的冷漠却可能说明了制度的稳定、优越，所以他们乐于见到民众的低参与率和低投票率，称“民主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就某些个体和群体而言的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③为此，他们在仍然沿用民主作为自己理论标签的同时，只重视它的程序性——而且这些程序是否符合民主的本质也是没有人推究的——的特征，关注譬如选举、政党、宪法一类形式上的制度，而忽视实质性的规范内容。

^① Parry 语，转引自 M.I. Finley:《古典民主原论》，李淑珍译（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91），第 25 页。

^② Ellen Meiksins Wood, "Demos versus 'We, the peopl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in Josiah Ober and Charles Hedrick (eds), *Democ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25.

^③ 这是亨廷顿在向“三边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关于现时代民主状况的报告中的结论，参阅米歇尔·克罗齐，塞缪尔·P·亨廷顿和绵贯让治：《民主的危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中亨廷顿所著部分。其他政治学者如马丁·利普塞特，在《政治人》一书中，也提出类似的结论，认为投票率与参与率的高低本身既非好事也非坏事。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聂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71 页以后。

这一类理论已经发展为一套非常内洽的学说体系，带有了库恩所论的在科学发展的常规科学时期理论所表现的特征，那就是将体系所不能容纳的现象拒于门外，拒绝承认它的意义。^①譬如在现代政治学者中常常见到的，以政治单位的规模太小、文化的同质性等为理由而将古典民主经验置之一旁、为现代民主另树旗帜的做法，其性质就可归入此类；再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对现代社会频繁发生的社会运动、对它的积极意义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这种直接来自底层的、政治体制变迁推动力量，他们的敌视大于好感，因而在他们的理论中并没有应有的地位。因此，对于这一类理论，如果我们沿用它的概念、思路 and 立场，则很难看清它的缺失：一种丧失了外在批判之维的理论（或实践）很可能意味着它的僵化、失去活力。要恢复对今天的民主实践和理论的批判、省察，最好的途径仍然是从古典民主中去发掘它的初始意义。只有回到古典的情境中，我们才能很明晰地判别，所谓“私性的公民”（private citizen）、“无关政治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 without Politics），本身即是一种词语的矛盾；所谓民主，就是指民众直接行使统治权力管理自己，就是一种倾向下层民众的统治。

自文艺复兴以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并不拒绝以古典为范例，罗马、斯巴达、雅典政制，都曾经是人们效仿、比拟的对象。只是，正是在民主政治已经渐渐确立之时，这种类比、借鉴突然不再引人关注。其中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及的古代城邦和现代民族国家自然和物质条件的差异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②

一个因素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思想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了建制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古典研究在早先的人文教育中具有优先的位置，而现在在这种趋势面前它的地位不再，自身也不得不随波逐流，接受这种专业化的现实，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日益强调科学方法。由此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譬如古典政治理论的研究，就转入了哲学和政治学，而不再为古典学研究所重。这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古典学者极少再去顾及他的研究题材以外的世界，关注他的研究与当代政治思想和实践所可能发生的联系。由此，学科的影响也日益衰微，不再是知识界的显学。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自由民主在十九世纪以来一直面临各种左右翼运动的挑战，尤其是左翼的运动在批判性和民众动员方面构成了自由民主一个强有力的对话者，以至于自由民主一系为了回应这种压力，将自己的立场又从早先曾经由密尔加以发展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回缩，断然拒绝了积极自由一脉的整个谱系，固守消极自由，以逻辑上的谨严、一致牺牲客观事实的丰富。^③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在将贡斯当、托克维尔等法国

^①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第20页。

^② 参阅 J. Peter Euben, John R. Wallach and Josiah Ober (eds), *Athenia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的 Introduction 部分。

^③ 参阅以赛亚·伯林的名篇“两种自由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以及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回应“消极自由的失足”（What is Wrong with Negative Liberty）。David Miller (ed.),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一书同时收录了这两篇文章。

自由主义者奉为精神的领袖时，只继承了他们的学理和洞见，继承他们对古代与现代不同理念、社会条件的甄别，却无视他们所表现的对现代自由理念所持的保留态度和与古代政治理念之间的亲和力。^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家拒绝了古代雅典的民主理念，而取向精英政治。

然而，进入七十年代之后，尤其到了九十年代冷战结束时，一方面西方政治生活的弊端不是理论逻辑上的完整所能遮掩得了的，同时，左翼运动的退潮为新的对话者的加入创造了条件。古典研究也恰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关注时政的倾向，于是取代了从前的左翼思潮，成为自由民主论的新的批评者。这里的开山之作就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位古希腊史家芬利所撰的《古代与现代的民主》(*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②，书中对精英理论下视政治冷漠为美德的政治文化提出了古典视角的批评。之后，古典经验又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话题和资源。社群主义与古典传统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而时下极受瞩目的“公民身份”的研究，其直接的对话者就是古代雅典实践和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公民一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tic)这两种传统。^③而谢尔顿·沃林(Sheldon S Wolin)、艾伦·梅金斯·伍德(Ellen Meiskins Wood)、詹妮弗·罗伯茨(Jennifer Roberts)这些学者站在古典立场对现代民主的重新审视，对我们反省、认识当代政治的实践及其目标都有巨大的帮助。

因而，根据晚近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近人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分析、定位，重新温习古典民主的遗产，以便更好地了解“民主”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确定它的价值内涵，从而为其在当代政治中寻找适当的定位，这既有可能，又有必要。这也是本论文的试图完成的工作。

第二节 方法与结构

本文既包括对两个阶段民主的发生史的简单考察，同时，还将概念的变化与制度实践的变迁相结合，将概念变化视为政治变革的一种加以考察。这里有必要对概念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先做一番探讨。

政治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没有语言，人类之中就不会有国家、社会、契约或和平存

^① 参阅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尤其其中与书名同名的一篇（李强译）。再看看托克维尔的著作以及以他为题的研究著作，包括前注中提到的 Alan S. Kahan 和 Larry Siedentop 的著作，还有 Peter Augustine Lawler (ed.), *Tocqueville's Political Science: Classical Essays*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2)，就知道他们的形象与关注消极自由的当代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有多大差别。

^② 也就是本书参考文献中所列的《古典民主原论》一书，台湾译者将其中文书名做了改动。

^③ 参阅 J.G.A. Pocock, “The Idea of Citizenship since Classical Times”和 Michael Ignatieff, “The Myth of Citizenship”二文，同收于 Ronald Beiner (ed.), *Theorizing Citizenship*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1995) 一书，及 Adrian Oldfield, “Citizenship: An Unnatural Practice”一文，收于 Bryan Turner and Peter Hamilton (eds.), *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s* (Routledge, 1994)。

在,就象狮子、熊和狼之中没有这一切一样。”^①承认这点之后,在两者的关系上,我们还必须克服两种倾向,一种以为语言(在这里是政治概念)是一种东西,而经验现实又是另一种东西,从而相比现实的变化,语言的变化纯粹只是一种次要的附带现象,是现实变化的反映。事实上,语言既是政治行为必不可少的媒介,它本身又是各种政治信念和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与政治现实的变化是一个复杂而又有紧密联系的过程,而绝非消极被动的反映。另一种倾向则承认各种概念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认为既然这些概念的含义在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变迁,那么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超历史的标准以衡量这些概念的真实含义。然而,概念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概念的变化背后又包含着连续性的存在,换言之,概念的变化并非随意、没有限制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概念变化的研究并非单单一种词源学的追溯,而是要将概念的出现、转变与政治角色使用这些概念时的历史情境、以及希望藉这些概念达到的政治意图相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概念的变化绝非消极、被动的适应性存在,而是各种政治角色试图理解、改变周围世界,试图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时的一种尝试和创造。在概念变化的基本机制背后,其实反映了人们求解政治问题的一种普遍模式。^②对概念与现实的这种关系的理解,也是本文的一个立足点。

在正文的分析中,作者主要选用欧美的思想和制度实践作为引例。对于其他文明中可能有的民主实践或理论未置一辞,既是由于作者本身的视野、学识所限,同时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首先,现在断言民主是起源于古代雅典是越来越不能让人信服了。在欧洲以外的地方,譬如地处西亚的古代腓尼基人,可能早就有了类似于希腊自治城邦的东西,而雅典人的字母乃至城邦概念本身很可能都是得自于他们。^③而在国内史学界,也有学者提出将先秦时代与古代希腊城邦时代并列,按照这种观点,城邦政治并非希腊所独有,而是人类社会在由血缘关系向政治关系过渡时一种普遍的政治单位形式,在这种城邦内部,都是以公民、自由民为基本组成,民主思想是主导意识形态。^④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有些固然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无疑至少拓宽了我们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认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政治生活的特性。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纵使上述观点得到证实,仍不得不承认,这些实践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远不能和雅典的民主实践相比。这一点,正如史家芬利所说:“希腊人之发现

^① 霍布士:《利维坦》,第18页。

^② 参阅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 Hanson (ed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的“Editors' Introduction”部分,及书中 James Farr: “Understanding conceptual change politically”一文。

^③ 参阅 Simon Hornblower,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 in Ancient Greece,” in John Dunn (ed), 前引书, p.2.

^④ 参阅日知:《中西古典学引论》(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及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二书。本文作者对中国古史并无研究,因而愿意把它当作一个有待验证和完善的假说看待,而无法表达取舍的意见。希望看到有更多相关论著出现。

民主，其意义正如哥伦布——而非某个北欧维京海员——发现美洲一样。”^①而且，倘若我们进一步推究民主、政治这些概念的含义，那么同意两位思想史学者梅厄教授和法勒教授在其书名中所表示的意见，——梅厄教授的著作叫《希腊人对政治的发现》，法拉的著作《民主思想的起源》，其副题为《政治在古代雅典之被发明》，^②——即，古代雅典人不仅是民主的开端，同时也是“政治”的开端，这并不为过，而且在学界中也有广泛的认可。^③而近代的民主起源于欧洲，而且它的思想的来源也都出自欧洲思想界，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所以本文的主体研究，都是以欧洲民主（与反民主）思想与实践作为对象。

对于民主的分类，由于研究者旨趣的不同、所设标准的差别可以有多种的划分法。除了前文提到的熊彼特的划分外，我们还看到有根据阶级属性划分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有达尔区分的麦迪逊式民主、平民主义民主和多元主义民主，^④或者也可以按照麦克弗森的思路分成保护型和发展型两种，或者是罗德尼·巴克区分的表达型民主(expressive democracy)和公民型民主(citizen democracy)，——在前一种，民主是实现我们意志或利益的某种手段，在后一种，民主本身即是一种目的；前者是要保卫或者促进自由，而后者本身即意味着自由。^⑤

本文所使用的古典民主和现代民主两分法，是一种简略的依据时间段做的划分。它们的性质，并不能从名称上看到，两者并不单单是一种历时性的关系。其实，无论古典民主还是现代民主，都有其自身一系列相关的价值观念做支持，——有彼此对政治、对人的不同理解，——它的真正的面目不是简单地以“一元论”和“多元论”这种暗含了某种褒贬色彩的对比所能勾勒的，^⑥要对它们进行明确的分析、考察，还需要把它们还原到各自所产生的历史情境中才能真正看清各自的着眼点。在本文对两种民主的考察中，一个特点就是并非仅仅就民主本身论民主，并非仅仅对制度、程序做简单的比较，而是同时考察每种民主政治背后所蕴涵的古人与今人对政治、对人的不同观念。只有把民主放在这样一种背景中，才能更有利于我们看清它的核心价值，解释它的起起落落。

而这一切之中最首要的，是要知道民主本身意味着什么，要使其含义不多也不少，就代

^① M.I. Finley:《古典民主原论》，李淑珍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第29页。

^② Christian Meier, *The Greek Discovery of Politics*, trans. David McLintoc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ythia Farrar, *The Origin of Democratic Thinking: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梅厄教授的著作对本文作者理解早期希腊世界发生的变化、及雅典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意义，有非常大的启发。本文对雅典民主历程的两阶段划分，也接受了教授的观点。

^③ 参阅 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53。

^④ 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北京，三联书店，1999）

^⑤ Rodney Barker,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in Alain-Marc Rieu and Gerard Duprat (ed.), *European Democratic Culture*. English Edition by Noel Parker (The Open University, 1995), pp84-5.

^⑥ 通常加于前者的形容词还有有机论的、极权式的，等等，认为其一旦从小型的、关系紧密的团体转而用于范围更大、多元文化的社会，必然导致恐怖统治。参阅 Roland N. Stromberg, *Democracy: A Short Analytical History* (M.E.Sharpe, Inc., 1996), p168。

表其自身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为它寻找适当的定位,同时,如果这种价值在现代政治中有体现的话,具体体现为哪些形式?如果它值得我们进一步追求,它又应该怎样推进才不至于与我们所珍视的其他价值冲突。

最后介绍一下本文的主要结构:

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本文用了较多篇幅(第二、三章)分析雅典城邦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作者将这一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涉及三个重要的变化:城邦的形成,公民身份的界定和“平等的政治权利”(isonomia)的确立。这一阶段难以确定它的起点,它的发生、发展与这一时期希腊世界总体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相关,但它最终的完成是在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510/9BC)。按照雅典人自己对民主的理解,这时所建立的政制还不能算做民主政治(虽然有学者这么主张,而且得到了相当的承认)。民主政治的真正产生要等到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剥夺贵族议事会的法定权力,将它交给由民众组成的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行使。这是普通民众掌握统治权力的真正标志,这也是民主的真义。而在这种制度形式的背后,我们发现,对于政治,甚至对于人本身,雅典人都有其特殊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与今人是迥异的。

民主两个时段的辉煌同时也是在提醒我们注意它的阴影:那就是中间超过两千年的空白。如果我们听从达尔的劝告,承认民主的批评意见对于我们恰如其分地理解民主的界限和可能性也有无可估量的益处,^①那么,充分考虑这段民主的空白期内人们对于民主的批评的意见,对于本书所担负的任务将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有必要对古典民主衰败之后所遭遇的攻击做一番专门介绍,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地思索后来的人们在选取民主统治的形式时,是如何回应这种种批评的。这就是在随后第四章第一部分的内容,第四章第二部分,即开始涉及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一些主要变化,主要是民族国家的出现、中央权力的增长和社会的原子化,原有的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出现了一股民主的潮流。而这种社会的潮流必然会要求政治权力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近世欧洲的民主化浪潮,其相应实现的政治建制也被称为民主制度。

第五章是对这种现代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并将其与古典民主加以比较,不仅是对比其制度形式上的差别,更指出两种理念背后对政治生活、对人本身的不同看法。由这种比较,作者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现代政治虽然在近代经历了一个民主化、向下层开放的过程,但在一定阶段后就与古典民主分道扬镳,并未往纯粹民主的方向发展。所以,单纯以民主称呼现代政治,将其称为民主政治,其来由可以理解,于学理并无依据,只是增加了概念的混乱。那么,现代政治中,是否完全没有了民主的因素,是否完全告别了古典的理想呢?这也是作者讨论的一个问题。

第六章结合前文的论述,结合作者对民主、对现代政治的认识,对我国近代以来的政治

^① 参阅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之“Introduction”部分。

发展和民主追求有一个总结，并对现实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初步的思考，也有一些针对性的意见。

第七章结论，对全篇内容做了一个简要的概括。

第二章

古典民主的前奏：

城邦、公民身份和政治平等

第一节：*Demokratia, isegoria* 和 *isonomia*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政体的划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他依照统治者人数的多少、政体所服务的对象而划分出六种政体，首先，依照是否服从公正原则、是否服务于城邦利益可以区分出正态和变态政体：遵循公正原则、以城邦利益为重，属于正态政体，否则则属变态政体。而后，依据统治人数的多寡，又可以区分出一人统治、少数统治和群众统治。而民主政体，在亚里士多德，就属于群众统治中列为变态政体的那一类，它的特征除了是数量上的多数统治外，就是以穷人的利益、而非城邦的利益为依归；它所对应的正态政体的类型则叫共和政体。随后亚里士多德又补充道，相比较数量而言，贫富是区分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更本质的标志：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果以财富为凭，则必定是寡头政体；如果以穷人为主体，则属于民主政体。^①

将多数统治分为正态的共和政体和变态的民主政体，这可能是理论家自己的创造，以便将他理智上认可的多数统治和当时实行的、他眼中的“极端民主制”加以区分，但就当时人们所使用的含义来说，这种区分并没有根据，可以说，这两种含义都包含在“民主”这个概念之中，只是依使用者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内涵。

首先，从词源上看，民主包含了两个部分：*demos* 和 *kratia*。前者的含义既可以指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平民”“穷人”，——而且通常有贬低、轻视的意思，——也可以指全体雅典人。而 *kratia* 既可以指力量，也可以指统治。^②这里我们主要考虑前一种歧义，它产生的原因不难理解。正如柏拉图所指出，民主政体起源于寡头政体中贫富分化后的党争，如果平民获得胜利，就建立了民主政体。^③当这种平民的力量最初兴起，要求分享原先贵族独据的统治权力时，贵族中保守的派别无一例外地会对这种力量感到恐惧，希望能限制它的作用。在他们，平民即代表了一种蒙昧、无智慧、听凭感情而非理智支配的力量。^④

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一词汇最早进入历史为我们所熟悉的时候，它或者是作为一个贬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第132-135页。

^② Anthony Arblaster,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18.

^③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330-331页。

^④ 这不独古代如此，近世民主进程的开头也有同样的过程发生。

义词，或者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术语，但并没有人在赞同的意义上使用它。一个例子就是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民主”这一词汇最早就见于本书，——波斯人在讨论他们该选择何种政体的时候，*demos* 是出现在反对一方的意见里，而支持多数统治的 Otanes 使用了另一种说法以表示这种统治：“首先，它的名称最佳：*isonomia*，即，法律面前的平等统治。”^①一用一不用，正可以看出 *demos* 在当时被赋予的感情色彩。

而另一方面，对于要求进入统治集团的力量而论，民主则意味着原有的公民团体范围的扩大，意味着要求以某种新的判别公民身份的标志取代旧的标志。就这个意义而论，在古代希腊，民主并不意味着对贵族统治原则的背弃，而只是——而且是在属于贵族阶层的一部分力量的支持引导下——把更多的人纳入统治集团。如果单就这一原则而言，说“民主制度实在上是贵族制原则扩张的结果，它们不仅不是对立的，相反，真正的贵族制就是民主制”，^②这是成立的。民主就意味着原先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公民团体的边界的扩大，但对于团体内部原先存在的原则却予以保留，没有加以改变。这种原则，它的对立面，简略地说，可以说正是萨托利为民主做否定性定义时用以参照的体制：个人独裁；^③更确切一些，可以说它意味着把公共事务置于一个公共的论坛中，参与者都以平等的身份加以讨论。所以，在这一时候，民主中的“民”（*demos*）所指的，就是这个包容了新旧成员在内的公民团体。在雅典，*demos* 常常被用做公民大会的代称，就是一个证明。

这里，还需要提到两个与民主关系密切的词。*isegoria*，它所表示的是在公民大会上同等的发言权。事实上，如果以公民大会作为希腊世界民主政体的判别标志并不准确，因为这种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公民大会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形式，民主国家有，寡头国家也同样具有。^④同时，如果追溯它的历史，可以发现它产生的年代非常久远，早在民主政治实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就看到了“公民大会”（*assembly*，在史诗中用的词是 *agora*，韦尔南证明前者正源于后者^⑤）的存在，只是，在这种大会上，主要角色通常都是贵族，偶尔出现的敢于发言的平民 *Thersites* 还是个小丑的角色。他思维混乱，灵魂污秽，滑稽可笑，最后遭到奥德赛的惩罚。^⑥所以，是否真正拥有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的权力，就决定了一个人、一个阶层是否真正参与到城邦公共事务的管理；民众争取自己权力的斗争，与他们争取公民大会上享有发言权的斗争始终同步进行的。*isegoria* 就意味着平民在公民大会上可以平等地

^① 转引自 Michael Gagarin and Paul Woodruff (trans. and eds.), *Early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omer to the Soph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83-85.

^② 洪涛：《逻格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22页。

^③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④ Raphael Sealey, *The Athenian Republic*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87), pp93-94.

^⑤ 参阅顾准，“希腊城邦制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97页。顾准先生对这种联系并无把握，只是猜测，韦尔南的研究正好解答了他的疑问。韦尔南的观点转引自 Alain-Marc Rieu, “Scientific Revolutions and Ideas of Democracy”, in Alain-Marc Rieu and Gerard Duprat (ed.) 前引书，p.22.

^⑥ 《伊利亚特》2.188-278。转引自 Michael Gagarin and Paul Woodruff (trans. and eds.) 前引书，pp3-6.